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十五



朱熹的宗教思想

[加] 秦家懿著 曹剑波译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十五

朱熹的宗教思想

[加] 秦家懿著 曹剑波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的宗教思想/(加)秦家懿著;曹剑波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3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3472-4

I. 朱… II. ①秦… ②曹… III. 朱熹(1130~1200)-宗教-思想-研究

IV. 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661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出版例言

一、为了促进我国国学研究的繁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旨在鼓励海内外学者在国学领域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一、本丛书的资助出版范围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为依据，围绕着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朱熹理学这一核心，进而探索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民生经济、宗教习俗等各领域的演变发展，以及深入研究在朱熹与闽学影响下的闽台及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尤其注重对东南海洋带文化传承的探讨，对中国文化在这些区域的演进，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努力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

一、本丛书面向国际性、专门性研究的学术著作，本着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原则，增进不同区域间的学术交流互动与中华文化认同。不同区域的学者各自遵循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和区别，从充分尊重学术交往的立场出发，出版时尽量做到保持原著的面貌，原则上不做过多的更改与硬性的统一，相信读者能够正确地给予甄别和分辨。

一、本丛书采用中文简体字出版，允许对书稿进行合乎丛书体例的调适和出版技术规范的处理。惟征引典籍的个别异体字、通假字以及习用专有名称等姑仍其旧；遇有错讹字予以订正，正字置于方括弧〔 〕内。另须特别说明者，使用〔编者按〕予以注明。

前 言

研究朱熹的权威、现已故的学者钱穆(Ch'ien Mu),在1970年左右时,曾告诉我:年轻时,他喜欢王阳明(Wang Yang-ming)的哲学;年长时,他更喜欢朱熹(Chu Hsi)的哲学。我想,他向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因为在日本时,我也听他向冈田武彦(Okada Takehiko)谈到过。在第一次见到钱先生,以及后来见到冈田武彦时,我三十五六岁,那时我刚完成我的王阳明研究。当时我很想去找一条通往知识与智慧的捷径。现在,我已年过六十,开始重视钱先生的评论。虽然王阳明仍旧是我的英雄,但是我已经对朱熹有更多的尊敬了。

事实上,我对朱熹感兴趣已经超过了二十年。我第一次提交的关于朱熹的论文(后来出版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思想和宗教”研讨会上(1973年)。甚至在那以前,我就意识到,如果不研究朱熹,我不可能真正理解王阳明。我也发现,尽管他们有很多分歧,但他们都有相似的精神视野以及对智慧的爱。朱熹留下的汗牛充栋的论著,非常适合对智慧充满好奇心且精力无限的人,但这种精神遗产对一个初学者而言要想迅速地了解是不容易的。因此,我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他。我主要把重点放在他的宗教思想上,集中在朱熹自己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包括太极、灵魂、宗教仪式和他的人性与修身的哲学。当然,我不能忽视他与陆九渊的争论,也不能忽视他涉猎的,最后又离开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然而,为了把我的注意力更好地放在这些中心问题上,除非所谈论的问题要求某些提及,否则我尽量不详细探讨他的生平、学问和政治理念。

在讨论朱熹的宗教思想时,我必须处理哲学的、宗教的和历史的材料。我主要遵循的是在一种广阔的历史文化框架内的文本注释的方法。我没有简单地重复或翻译文本所说的内容,而是为了揭示它

们而提供一种宗教—哲学的解释。我已经广泛地阅读了朱熹本人的著作和《朱子语类》，并把重点放在其中感兴趣的宗教上。我也从他的一些前辈和同时代人的著作中，及许多中文、日文、英语、法语和德语出版的第二手材料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由于朱熹自己写的东西如此的多，而且他的研究又如此的广，以致我不能说我已经看过他在这个主题上所写过的每一行或每一个字。

我已避免过分地使用诸如“一元论”或“二元论”这些术语来描述朱熹的哲学。尽管理/气形而上的结构暗示了一种二元论，但他强调太极是理，理一分殊，这使得他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二元论。我认为用来描述他的思想系统的最好的词是“知识系统化的”(architectonic)，因为它包含了由一些主要概念组合在一起的许多部分。我也不把朱熹描绘成一个有神论者或无神论者。这些术语在中国思想中不太重要，虽然追求终极或绝对仍是他的宗教—哲学追求的强大动力。

正如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诠释学所建议的那样，我用同情的理解尝试着提出我的主题。施莱尔马赫认为，他的任务就是理解他人在讲话和文本中已说过的东西，并发现真理。在这里，我不仅要进入朱熹的文化背景中，而且力图通过重构他的宗教哲学意识的发展来把握他的意图。在一定的程度上，这是可能的。应该指出的是，另一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的思想对我也是有帮助的，他指出，真理即是去蔽(希腊语为 aletheia)。

朱熹自己曾说过，智力的发现就像发现隐藏的宝库，正如他对《中庸》的理解那样。《中庸》的核心教义不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平凡的中点，而是发现个人自己精神的中点，即个人存在的深邃的中心。朱熹把“中”(middle)这个概念描述为是从古代先哲那里传下来的智力遗产，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不幸地)被贴上了“正统”这个标签，然而，正是这个概念具有一个秘密的某些特征，这个秘密是关于终极实在即“道”的。也许，这个主旨过于精妙，并具有宗教精神的性质，使得它很难为人所理解，不仅对我们如此，甚至对朱熹本人也是如此。毕竟，这种探究包含了神秘的层面。“神秘主义”这个词的希

腊起源是“muein”，“muein”的意思是在仪式开始时闭上眼睛或嘴唇，即沉默，因此暗示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性和机密性。希腊词“mustikos”被基督徒用来指称《圣经》的神圣目标(spiritual meaning)。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术语是非常适用于研究古典文本的，正像新儒家学者如朱熹那么应用一样。今天，“神秘主义”一词可能指称对整个人生和宇宙的神圣目标的追求，以及与这种神圣目标相关的经验。

应该指出的是，我用“道”这个词来指称被当作是终极目标的这类东西，它是儒教、道教和佛教等所有学派所理解和奋斗的终极目标。它的特定含义必须由语境所决定，这种语境将揭示这种亲缘关系。对儒家弟子来说，道始终保留有道德的特征。对道士来说，对本体论的道的关注使他们达到了宇宙论的视野。对禅宗教徒来说，它始终是内在的和经验的。

有许多关于朱熹的书籍。有几本书是由已故的陈荣捷(Wing-tsit Chan)写的，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本书中，我不只是重复旧的信息或解释。相反，我努力提供对《太极图》以及其他东西的一种新的说明。这种说明基于许多资料，其中有一些是为人所不知的。因此，我不得不更详细地把它们解释清楚，而且这种工作至今仍未有人用英语做过。在讨论朱熹的鬼神观时，在介绍朱熹对《中庸》中的“中和”理论演变的解释时，我都在不断地探求、协调和完善。在我的总结性章节中，我提供了批评的声音，其中一些是真实的，另一些只是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政治的。我指出了朱熹的一些局限性，也提出了我自己所理解的一些问题。最后一章处理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他的持续相关性，以及那些每天仍在压迫我们的紧迫问题。我也列了一个朱熹生平与著作的大纲(附录一)，以及一个更详细地审视与《太极图》相关的某些争议(附录二)。

在我写这本书时，我禁不住想起这些年来，在我横跨许多国家和大陆的职业生涯中，我从老师、朋友、同事和学生那里接受到的教诲和支持。1971年，在澳大利亚，柳存仁(Liu Ts'un-yan)第一次把我引入了道教的宝库里，随后继续帮助我明白为何朱熹会潜心于道

学。1992年,当我与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巴黎交流时,他鼓励我继续追从这些兴趣;与此同时,在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th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研讨会上,我的《朱熹论佛教和道教》论文激起了富有启发的讨论,这些讨论后来证明对我写作这些章节很有好处,因此,我要感谢里昂·范德米尔色(Léon Vandermeersch)的盛情邀请。由陈荣捷1982年组织的“国际朱熹会议”,以及经常由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领导的北美的其他朱熹会议或与朱熹相关的会议,还有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召开的会议,都提供了富有启发的交流,这些交流涉及许多与朱熹有关的议题,包括一些我最终纳入本书的议题。在更早,大约1977年,由约翰·科布(John Cobb)组织举办了一个关于怀特海(Whitehead)与中国哲学的会议,会议的论文出版在1979年的《中国哲学杂志》上。这个会议为我提供了一个思考朱熹和怀特海关于上帝这个主题的机会,书中附录三是作了些修改后的成果。

我特别感谢蒋经国基金会(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和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uncil of Canada)为我提供的研究经费,这些资助使我能完成这一项目。我很幸运还有一个学术圈的存在,事实上,它不仅存在于北美地区,而且也存在于日本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些人对朱熹的共同兴趣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有幸在香港遇到哲学家唐君毅(Tang Chun-I)和牟宗三(Mou Tsung-san),稍后,我荣幸地在中国大陆遇到了冯友兰(Fung Yu-lan),并在美国再次遇到他,当时他的女儿冯宗璞(Feng Zhong-pu)在陪伴着他。这些会议和交流使我觉得朱熹的思想仍然活着而且是有意义的。在可能的范围内,我试图把他们关于朱熹宗教思想的各个方面的正反意见综合起来。

无论是在灵感和评论上,还是在寻找书目的来源上,许多人都帮助过我。我非常感谢大卫·迪尔沃思(David Dilworth)在学习期间阅读了原稿,也感谢他有启发性的和富有挑战的提问、评价和批评。

也感谢世界各地的同事：感谢惠伦·莱(Whalen Lai)对太极与佛教富有启发的评论；感谢霍伊特·迪尔曼(Hoyt Tillman)丰富的历史视野；感谢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和弗兰克·迈尔斯(Frank Myers)所提供的软件支持；感谢丹·奥弗迈耶(Dan Overmyer)在编书目上的点子；感谢余英时(Yü Ying-shih)的善意的学术建议；感谢约书亚·福格尔(Joshua Fogel)在早期的中文书目资料上的帮助；感谢罗伯特·詹美罗(Robert Gimello)、约瑟夫·阿德勒(Joseph Adler)、张艾伦(Alan Chang)和他们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同事们的批评和意见；感谢后藤圣子(Seiko Goto)在采购日文书目材料所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几个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人提供的及时帮助：王国尧(Kwok-jiu Wong)提供了技术和书目编写的援助；伊恩·贝尔(Ian Bell)仔细阅读了手稿；乔伊斯·谭(Joyce Tan)和其他人提供了图书检索的帮助。我要感谢长期来帮助我的伴侣欧为尔(Will Oxtoby)，因为他总是用他的细心周到始终如一地支持我的努力。我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职员。一个全面的名单可能太长，总之，我感谢所有曾帮助过我的人。

对我来说，仍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我决定用韦德—贾尔斯法(Wade-Giles)来译音，因为我更喜欢把我研究的哲学家朱熹的姓名拼写为 Chu Hsi 而非 Zhu Xi。毕竟，Z. X. 不是我喜爱的他的名称的缩写。我也不喜欢韦德—贾尔斯音译系统中用 i 音来译长 e 音，所以当那个音出现时，我尽力用 yi 来代替。我为所有重要的历史名称都提供了替代的拼音，也用拼音来为中国大陆的当代学者和名人标注。对中国大陆外的 20 世纪的中国名人，我用他们自己音译名来音译他们的名字。从音译技术的术语来说，我用上标来区分同音字。除非另有说明，本书的英文都是我自己翻译的。

在附录四中，我对关键术语作了些解释。在附录四中，我还特别挑选出那些并列的或对立的成对的技术性的哲学术语来解释。除了五经外，我用斜体字来标明古典的和哲学书的标题。在书目中，我使用韦德—贾尔斯法来音译所有中文的书和论文的标题。我也提供一

个中日的名称和术语的词汇表,这个词汇表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清音译。

在长期研究朱熹的过程中,我的想法已有变化和发展。我对书中的任何不足或缺点负责,并期望从读者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秦家懿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

2000 年 3 月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朱熹时代的思想界 ······	(1)
一、引言 ······	(1)
二、宇宙学的关注 ······	(4)
三、精神的和伦理的关注：聚焦四书 ······	(9)
四、宗教的关注：道教和佛教 ······	(10)
五、太极：世界和人性 ······	(16)
六、周敦颐的《太极图》 ······	(21)
七、理和气的形上学 ······	(28)
八、结论 ······	(32)
第二章 太极 ······	(41)
一、引言：《易经》中的宇宙论 ······	(41)
二、太极：这个概念的历史 ······	(42)
三、作为朱熹秘学的太极 ······	(47)
四、太极：“理”还是“气”？ ······	(50)
五、一个象征的两个面 ······	(53)
六、对“无极”的考察 ······	(59)
七、结论 ······	(62)
第三章 鬼神 ······	(70)
一、引言 ······	(70)

二、论天	(71)
三、鬼神	(78)
四、论与鬼神交流	(83)
五、结论	(87)
第四章 礼	(96)
一、引言	(96)
二、礼学家	(97)
三、一位礼仪的改革家	(104)
四、朱熹对礼仪的践行	(113)
五、乐与礼	(114)
六、结论	(115)
第五章 人性与道德的完善	(123)
一、引言	(123)
二、人性论	(124)
三、理：内在性与超越性	(131)
四、情	(134)
五、自我超越的伦理学	(138)
六、仁的学说	(139)
七、结论	(145)
第六章 修身	(152)
一、引言	(152)
二、天理对人欲	(154)
三、中和说	(156)
四、打坐	(161)
五、敬	(164)
六、求知：致知	(168)
七、结论	(172)

第七章 与陆九渊的哲学之争	(179)
一、引言	(179)
二、道问学或尊德性：鹅湖之辩(一)	(180)
三、九卦：鹅湖之辩(二)	(189)
四、义与利：一次讲演	(192)
五、其他的争辩	(193)
六、结论	(198)
第八章 朱熹与道教	(205)
一、引言	(205)
二、朱熹与道教哲学	(206)
三、朱熹与道教	(210)
四、两本特殊的道书	(213)
五、朱熹对道学的贡献	(220)
六、结论	(221)
第九章 朱熹与佛教	(230)
一、引言	(230)
二、朱熹学佛	(231)
三、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235)
四、朱熹对佛教的批评	(238)
五、佛教对于朱熹哲学的影响	(243)
六、结论	(248)
第十章 朱熹的批评者	(255)
一、引言	(255)
二、朱熹生时所受的批评	(256)
三、来自王阳明的批评	(258)
四、来自传教士的批评	(260)
五、清朝的批评者	(262)
六、日本的批评者伊藤仁齐和荻徂菜	(265)

七、现代的批评者	(268)
八、结论	(275)
第十一章 朱熹的相关性.....	(283)
一、引言：正统性与相关性.....	(283)
二、朱熹的核心思想	(284)
三、朱熹的思维方法	(286)
四、常变说	(289)
五、结语	(303)
附录一 朱熹生平和著作年表.....	(312)
附录二 关于周敦颐《太极图》的一些争论.....	(316)
一、可能的道教起源主张	(316)
二、无极图	(318)
三、一种可能的佛教启示	(319)
四、质疑周敦颐的传稿	(321)
五、一些结论	(322)
附录三 朱熹与怀特海：上帝和世界	(325)
一、引言	(325)
二、结构的比较	(327)
三、范畴的设计	(329)
四、关于上帝的问题	(333)
五、一种偶极的终极？	(337)
六、结论	(341)
附录四 关键术语的解释.....	(346)
一、术语解释	(346)
二、术语表	(350)
三、缩略语	(368)
参考文献	(371)
译后记：西方汉学界朱子学研究的里程碑	(412)

第一章

朱熹时代的思想界

有风还自掩，无事昼常关。

开阖从方便¹，乾坤在此间。²

周敦颐

一、引言

打开一本书，我们就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门。在中国，对任何一个主题的介绍，通常都叫“入门”。门象征通向智慧和圣贤。两个祖卦，即乾☰和坤☷，与它们的阳爻和阴爻，通常代表的是超出这扇门的神秘之物。对周敦颐(Chou Tun-yi, 1017—1073)来说，神秘之物与他在一起，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与开门和关门在一起。周敦颐知道，这扇门有时是关闭的，有时是打开的。由于喜爱自然而然，因此他并不坚持智慧要在开这扇门中才能发现。虽然如此，他仍旧宣称，智慧是在开和关之中。当然，在这里，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开”和“关”也可以用作呼吸的一个隐喻，通过呼与吸，达到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尤其是太极说，与朱熹有很多联系。朱熹，号晦庵(1130—1200)，出生于周敦颐死后约60年。一本打开的书使我们能够进入一个主题。就我们而言，感兴趣的主题是朱熹的宗教思想，或者，如果我们愿意，可以称他的宗教思想为宗教“智慧”。我们必

须在他著作的遗产中寻找他的宗教智慧。的确，他的著作中有非常丰富的宗教智慧。正像周敦颐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将遇到一扇门，它有时是打开的，有时是关闭的，或者也许更多的时候经常是半关闭的。这是由于某些语词和文本的含糊性以及时间间距，把我们与它们分开了。虽然如此，为了打开朱熹的思想宝库，我将尽我最大的能力，努力打开这扇门。然而，由于这扇门有时只是半开着的，因此我将不得不阅读字里行间的意思，并根据上下文加以解释。

为了对朱熹的思想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首先需要探讨朱熹发现自我并发展自己的思想的历程。³ 周敦颐和其他 11 世纪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北宋（960—1127）。北宋的都城在开封，当时的国家是统一的。朱熹生活在 12 世纪的南宋（1127—1279），南宋的都城在临安（今杭州）。南宋时期，北方已经落入金人之手。南宋是一个政治分裂、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正在不断地被来自塞外的异族所骚扰。中国开始向闭关自守方向转变，伴随着哲学和宗教的探索的孤立主义，强化了这种盛行的情绪。这种孤立主义回避所谓逃避现实的佛教的影响，回归到以儒家学说作为精神灵感的来源。⁴ 最终，一种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哲学发展了出来，它的创立与一个名叫朱熹的人有关。

朱熹的祖籍安徽徽州，然而，他出生在南方福建的尤溪，在那里，他的父亲朱松（Chu Sung, 1097—1143）任县尉。作为一位对哲学有强烈兴趣的学者，朱松过早就去世了，他把他十三岁儿子的教育委托给他的朋友。朱熹不是一个普通的少年。他是一个早熟的年轻人，十八岁时就中了进士。然而，他的理想不是要取得官场上爬到高位的那种成功。他曾在福建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并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经常处于半隐退的状态（semiretirement）。他写了大量的哲学和学术著作，对不少经典作了评注，其中还包括对“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所作的集注，另外还有一系列其他著作。他吸收了许多弟子，并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和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的学派，因为在福建，所以叫闽学。⁵

在他死后,闽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在北方被异族金人统治的时期,朱熹用爱国的热情反对国家的分裂。为了重建他的哲学前辈所建立的哲学基础,他重新编辑和出版了他们的著作,这对他那个时代及以后的文化生活都有贡献。他对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给出自己的回应。他还建立了一个关注宇宙观和形上学,重视人性和情感以及修身的体系。

在过去,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朱熹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宗教的思想。这种倾向是某些耶稣会传教士的解释。这些传教士憎恨发展“性”和“理”的哲学,认为这种哲学将取代他们更乐意接受的早期宗教信仰中关于上帝和天的宇宙观。大约在 75 年前,耶稣会的汉学家斯坦尼斯·李格(Stanislas Le Gall)称朱熹为一位唯物主义者:“一位杰出的健谈者和一个可憎的哲学家,在超过 7 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男人成功地强加给他的许多同胞一种古典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解释。”⁶

大约 40 年前,一群有影响力中国思想家来到香港和台湾,发表了“重新评价汉学和重建中华文化宣言”(1958 年)。在张君劢(Carsun Chang, 1886—1969)的领导下,徐复观(Hsü Fu-kuan, 1903—1980)、牟宗三(Mou Tsung-san, 1909—1995)和唐君毅(Tang Chün-i, 1907—1978)把天道与人道和谐作为儒家传统的核心,批评了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的这些误解,挑战西方汉学家,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这一核心精神上。⁷这个文件的几个签名者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某些西方哲学的视野下,重新诠释了这个遗产,这些作者去世后出版的东西,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内容。

最近,这两路思想奇怪地融合了。我指的这两路思想,一路是:越来越多的、通常被称为新儒家的西方哲学家,在对朱熹进行研究时,揭示出其思想结构中不可否认地包含有精神的,甚至宗教的因素。⁸另一路是:早些时候,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启发的中国大陆的学者,在意识形态上对朱熹和其他人的批判性研究中,为了诋毁他们的思想,指出这些思想家有宗教信仰。⁹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